

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的考古学研究

刘德凯¹

（早稻田大学 文学研究科 日本 东京 162-8644）

【摘要】：利用考古学基本的方法论，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的制作、流通、使用和埋葬这一动态过程。该类带具发轫于北方草原，西汉中期汉帝国开始制作，并逐渐采用了西亚的焊接技术。出于羁縻的目的，西汉时期专门将该类带具分配给边郡统治层。东汉以降，马蹄形带具融入帝国内部的舆服制度中，并演变为用于随葬和祭祀的礼制器物。

【关键词】：汉晋 马蹄形带具 金工制品 生产流通

【中图分类号】：K876.4 **【文献标识码】：**A

马蹄形带具是流行于汉晋时期的一种腰带部件，平面形状为一端呈弧形，另一端为方形的马蹄形，散见于中国和朝鲜半岛北部。汉民族使用的一般仅有带扣，游牧民族使用的由带扣、带头和带銙构成，本文统称为马蹄形带具。材质以金银为主，也有少量鎏金铜和玉制品，饰以龙纹、虎纹和动物纹等纹样。本文立足于考古资料，系统梳理马蹄形带具的纹样和形态等特征，分析其历史背景和嬗变的意义所在。

一、中日朝的研究概况

民国时期流落海外的马蹄形带具，多辗转藏于各类博物馆。最早经科学考古发掘的资料，是 20 世纪 50 年代云南晋宁石寨山 7 号墓出土的带具，迄今至少有 29 例资料被公布。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收藏或发掘机构正式公布的遗物资料，其中出土品 20 例，海内外博物馆收藏品 9 例。

以考古学视角对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进行研究的学者，在国内以孙机为主。孙机将该类带具称作带鐻、金带扣和银带扣等，并对制作地和制作技术进行了相应探讨^[1]。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了马蹄形带具与组玉佩等，韦正认为该例是西晋时期官僚以朝服入殓埋葬的具体事例^[2]。谭盼盼等对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例进行了自然科学上的分析，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能谱仪（SEM-EDS）等手段对带具不同部位的含金量进行检测，并还原了制作时的焊接技术^[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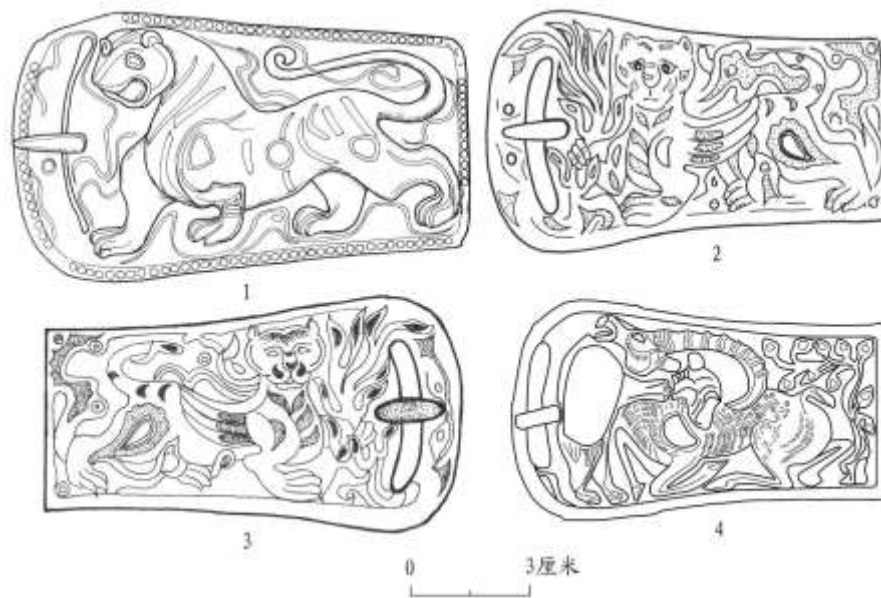
日本学界的研究先驱是町田章，其基于马蹄形带具的形状和典型的制作技术，将之称为“马蹄形打出铰具”，认为这是匈奴动物纹牌饰和汉民族革带融合的产物。町田认为，朝鲜平壤汉墓的出土例，应是由西汉中央政府给予乐浪郡官僚豪族的威信象征物^[4]，这一观点对后来研究者产生深刻影响。志贺和子在町田章的研究基础上，详细分析了 8 件马蹄形带具的形制和历史背景，进一步认为这类带具是汉帝国将周边地区纳入势力范围后专门赋予统治层的器物，并逐渐渗入帝国内部的舆服等级制度中^[5]。藤井和夫针对焊接等制作工艺，进行了尤为翔实的复原探讨，并指出马蹄形带具是西亚的金属工艺与汉王朝的龙纹相结合的产物^[6]。近年来的研究者以大谷育惠为代表，其认为施以飞马纹的马蹄形带具，带状分布于北纬 50° 以北的欧亚大陆，反映了各地域间的联系^[7]。

作者简介：刘德凯（1993-），男，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考古。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关于朝鲜半岛的研究成果，作为出土的朝鲜以发掘报告和遗物图鉴为主。韩国主要围绕其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的平壤石岩里 9 号墓出土例进行探讨，例如鲁提炫等利用荧光 X 射线等分析手段对该例进行检测，分析了带具各部位的金属成分含量^[37]。

先行研究关于马蹄形带具的年代和金属工艺等做了较多的探讨，尤其是志贺和子对照文献记载，细致地考证了中国周边地区所出土 8 例带具的具体年代和历史背景。诸如此类的研究各有侧重，且可供使用的资料十分有限。因此本文的思路是基于不断增加的带具资料，利用考古类型学等方法，通过厘清马蹄形带具的纹样、金属工艺等特征，管窥该类遗物的历史背景。



图一//A I 型带具

1. 平壤贞柏洞 37 号墓例 2. 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例 (1) (M7：72) 3. 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例 (2) 4.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 (3) (2002. 201. 187)

二、类型分析

马蹄形带具作为施以纹样的金工制品，最能反映遗物特征的要素是制作技术、纹样题材和材质。据此将之分为四个型式（表二）。

A 型采用锤揲工艺打制凸出于金属表面的纹样，未使用焊接技术。根据纹样题材分为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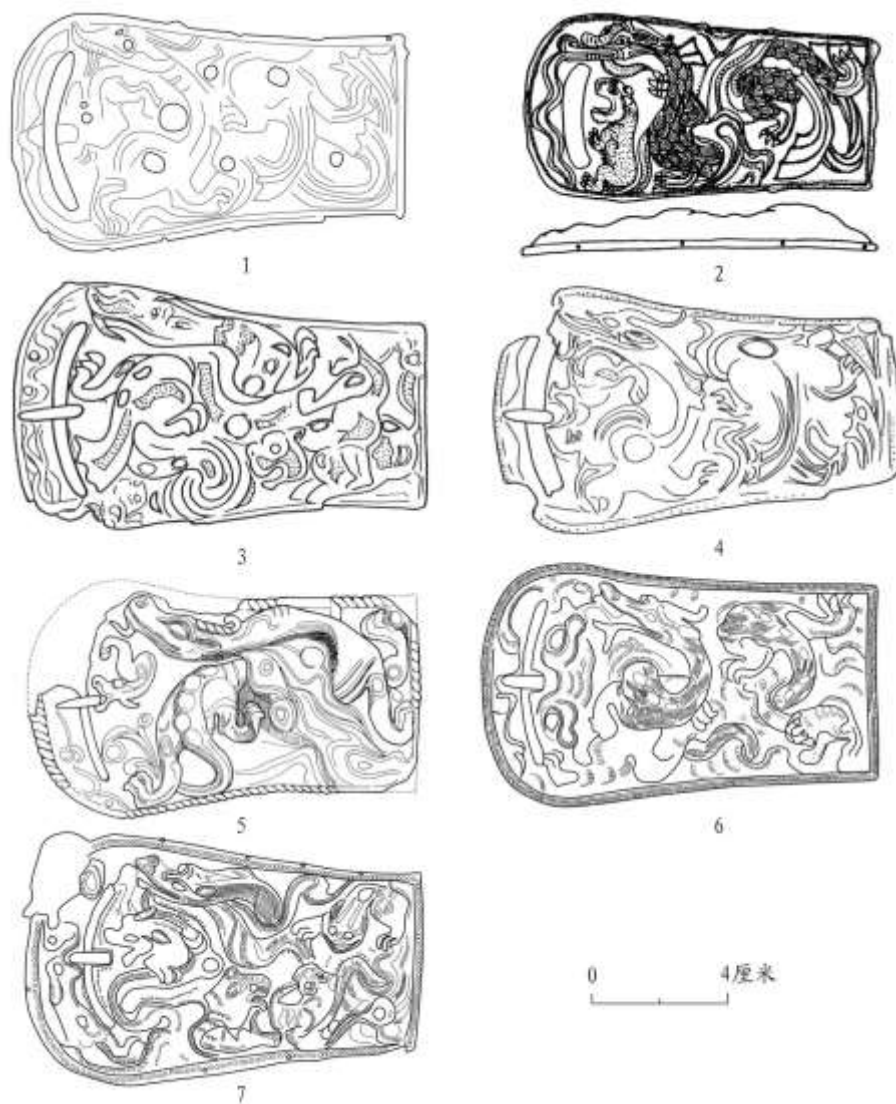
I 式纹样题材为北山羊或虎纹，以银制品为主。包括平壤贞柏洞 37 号墓例、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例 (1) (M7：72)、石寨山 7 号墓例 (2)、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 (3)（馆藏编号 2002. 201. 187）。

平壤贞柏洞 37 号墓例为银片上打出虎纹，躯干上有鎏金痕迹（图一：1）^[38]。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例 (1) 在 1959 年发掘报告中被称作“银错金带扣”，即错金的银制品。银片周缘内折，并等距留有 15 个穿孔，用来将其固定在带鞅上，弧形端用针状金属轴固定扣舌。虎纹朝左，右前肢持有树状纹样（图一：2）^[39]。石寨山 7 号墓例 (2) 的虎纹朝右，左前肢持有树状纹样（图一：3）^[40]。该例并不见于发掘报告中，但是 1998 年《晋宁石寨山》掲載的带具图片与上述出土例 (1) 迥然有别，因此本文暂将其作为不同的出土例处理，并有待于进一步查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例 (3) 是从金片后面锤揲出北山羊的形象，金片表面使用篆刻技术

表现出北山羊的角和体毛等细节（图一：4）。

II式纹样题材以蟠龙纹为主，多为金制品。蟠龙纹的特征是头部扁平，部分躯干隐没于云纹后。包括云南广南牡宜遗址 4 号墓例、昆明羊甫头墓地采集例（YC：219）、平壤贞柏洞 92 号墓例、平壤贞柏洞 2 号墓例、平壤石岩里 219 号墓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1）（馆藏编号 2002. 201. 185）、大都会博物馆藏例（2）（馆藏编号 2002. 201. 186）等。

广南牡宜遗址 4 号墓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黑支果乡，出土的马蹄形带具用锤揲工艺打出蟠龙纹（图二：1）。昆明羊甫头墓地采集例和牡宜遗址 4 号墓例相差无几，龙的躯干扭曲，尾巴在尾端分叉，形如翼手目动物的翅膀（图二：2）^[41]。平壤贞柏洞 92 号墓例的左下角残损，前端有锤揲打出的云气纹并镶嵌 2 颗玉石，后端有一骑乘姿势的人形纹样（图二：3）^[42]。平壤贞柏洞 2 号墓例的周缘打出有粟粒状的点纹，龙纹头部下面有小型兽纹，张口位置安装了活舌的根部。右端有骑乘状的人形纹样，头朝右匍匐在龙纹躯干之上（图二：4）^[43]。平壤石岩里 219 号墓出土 2 例，如志贺和子所指出的那样，《朝鲜古文化综鉴》第 3 卷记载了 1 例，发掘报告记载了 2 例，其中 1 例未公布图片（图二：5）^[44]。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例（1）的纹样的细节篆刻较为绵密，周缘篆刻有杉叶文（图二：6），所藏例（2）和前例类似，左上角留有铁锈（图二：7）。



图二//AII型带具

1. 广南牡宜遗址 4 号墓例 2. 昆明羊甫头墓地采集例 (YC: 219) 3. 平壤贞柏洞 92 号墓例 4. 平壤贞柏洞 2 号墓例 5. 平壤石岩里 219 号墓例 6.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 (1) (2002. 201. 185) 7.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 (2) (2002. 201. 186)

B 型兼有锤揲和焊接工艺, 纹样构图以走龙纹为主, 金质。根据龙纹躯干的表现形式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焊接一排金珠象征龙纹躯干。根据金片周缘的装饰分为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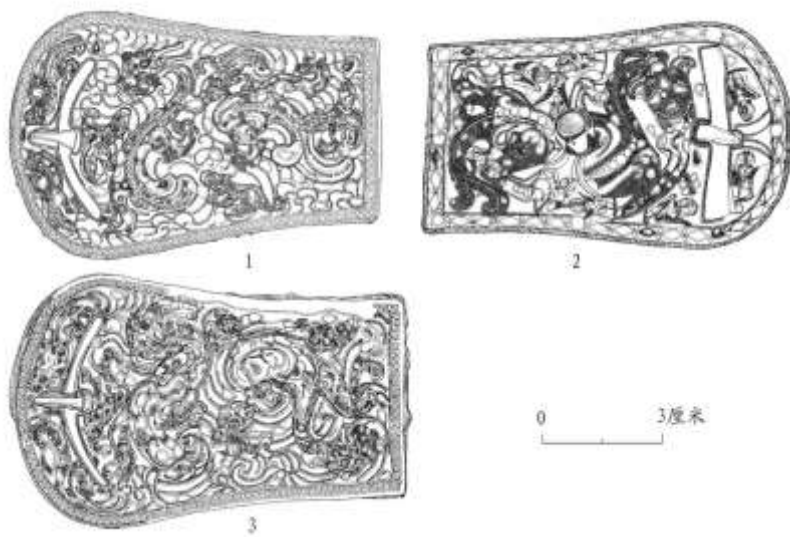
I 式金片周缘焊接连续的 Ω 形金线。包括平壤石岩里 9 号墓例、天水市博物馆所藏例等。⁹

平壤石岩里 9 号墓出土例, 金片厚约 0.3~0.7 毫米。锤揲工艺打制出龙纹, 龙纹躯干焊接一串金珠, 金珠直径为 0.3~1.6 毫米 (图三: 1)^[45]。天水市博物馆所藏例是 1975 年群众捐赠给天水市文化馆的收藏品, 后移交至市博物馆。该例部分残损, 和平壤石岩里 9 号墓例的纹样配置、尺寸等相同, 不排除同工品的可能。

II 式金片周缘焊接连续的菱形框, 用来镶嵌玉石。包括大连营城子 76 号汉墓例 (2003M76: 24)、日本滋贺县美秀博物馆藏例、安徽寿县寿春刘延墓例 (编号 003383, Z: 579) 和湖南安乡刘弘墓例 (标本 11) (图三: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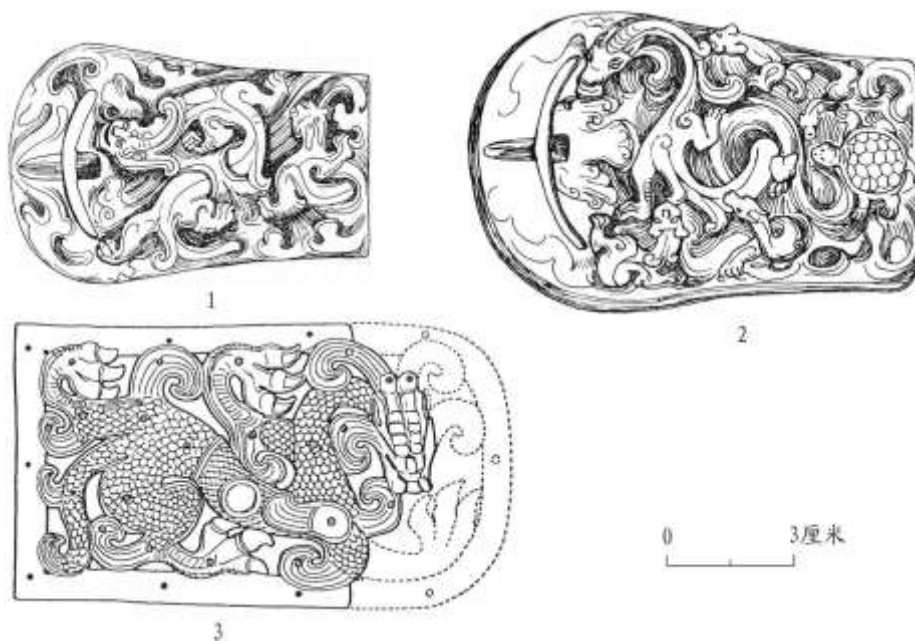
大连营城子 76 号汉墓, 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工业园区, 发掘于 2003 年。出土的马蹄形带具由扣舌、圆环和金属片构成, 扣舌呈楔形, 根部中空用来穿过扣舌环^[47]。以锤揲技法打制出凸起的龙纹, 金片背面有规则的加工痕迹。日本美秀博物馆藏例立体表现出的龙纹头部, 焊接大量的金珠和金线。安徽寿春刘延墓例的扣舌残缺, 带扣中央留有圆形框, 原应镶嵌有玉石。

Bb 型未采用焊接金珠的方式表现龙纹躯干。包括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例、个人藏例、PierreUldry 藏例^[48]。



图三//B 型带具

1. Ba I 型 (平壤石岩里 9 号墓例) 2. Ba II 型 (安乡刘弘墓例标本 11) 3. Bb 型 (焉耆博格达沁古城例)



图四//C 型带具

1. 洛阳夹马营 C3M15 东汉墓例 (M15:2) 2.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例 3. 上海博物馆所藏例

焉耆博格达沁古城例采集于博格达沁古城黑圪达墓地，带扣的外缘用两根逆时针扭成的金线围成边框，边框内用金线焊接出连续的 Ω 形纹样。金片打制出凸起的 8 条龙纹，镶嵌较多水滴状玉石（图三：3）^[49]。

C 型玉质，浮雕有龙纹等纹样。包括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 C3M15 墓例 (M15:2)、上海博物馆藏例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例。

洛阳夹马营路东汉墓出土马蹄形带具的扣舌残缺，前端有新月形穿孔和用来安装扣舌的凹槽。表面浮雕龙纹，背面平整，共有 9 处穿孔用来将其固定在带鞅上（图四：1）^[50]。上海博物馆所藏例的背面两侧刻有铭文，分别为“将臣范许奉车都尉臣程泾令奉车都尉关内侯臣张余”和“庚午御府造白玉袞带鲜卑头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工七百”^[51]。孙机认为该例为晋式带具的带头（图四：3）^[52]，该观点也被藤井康隆所继承^[53]。由于一端残缺导致完整形制不详，本文暂将其归为马蹄形带具的范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例浮雕多条龙纹，后端中部浮雕有乌龟（图四：2）^[54]。

D 型锤揲打出动物纹，材质为包金铁芯或鎏金青铜。包括吉林省榆树市老河深 105 墓例（105：16-1、2）、56 号墓例（56：3、37）、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例（图五：3—5）^[55]、扎赉诺尔 1 号鲜卑墓例（图五：6、7）^[56]、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墓例（图五：8、9）^[57]、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例（4）（馆藏编号 24.174.6、7）（图五：10、11）。

以老河深 105 墓出土品为例，材质为鎏金青铜，由带扣、带头和带銙构成，平面形状均为马蹄形。带扣和带头均为锤揲工艺打出的有翼兽纹，从四肢推测应为偶蹄科动物的马，但是吻部有独角（图五：1、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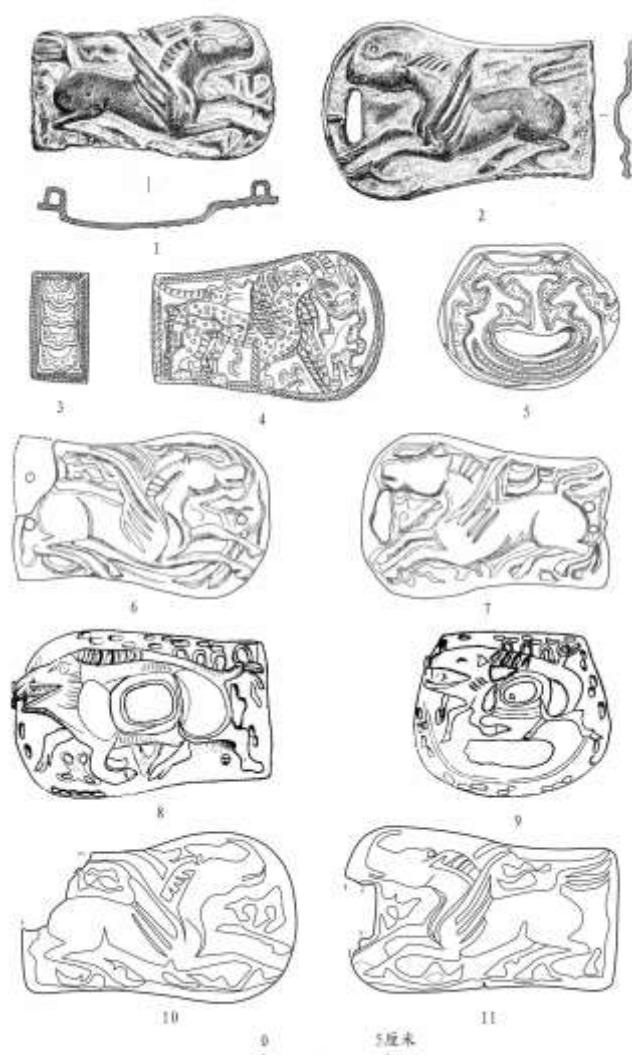
三、编年分析

基于上述型式分类，可以把握各类带具的基本特征，并确定相对的制作年代。作为易磨损的金属制部件，马蹄形带具从制作到废弃（埋葬）的过程应该较为短暂。因此通过墓葬和伴出遗物的年代，可以推测大致的绝对年代（图六）。

A 型的变化方向，是纹样题材从 I 式草原动物的北山羊纹和虎纹，演变成 II 式汉文化抽象的蟠龙纹。I 式中的平壤贞柏洞 37 号墓为异椁异棺墓，北部边箱出土了马蹄形带具、日光镜、昭明镜和“地节四年”（公元前 66 年）纪年铭的漆器。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为土圹墓，除带具外还出土有日光镜，该墓的形制和旁边出土“滇王之印”的 6 号墓相似。II 式中的平壤贞柏洞 2 号墓为同椁异棺的木椁墓，椁箱出土有银质“高常贤印”、白铜质“夫租长印”、日光镜、昭明镜和“永始三年”（公元前 14 年）纪年铭的黑漆柄。因此推测 I 式的年代为西汉中期（武帝—宣帝），II 式年代为相对较晚的西汉晚期（元帝—哀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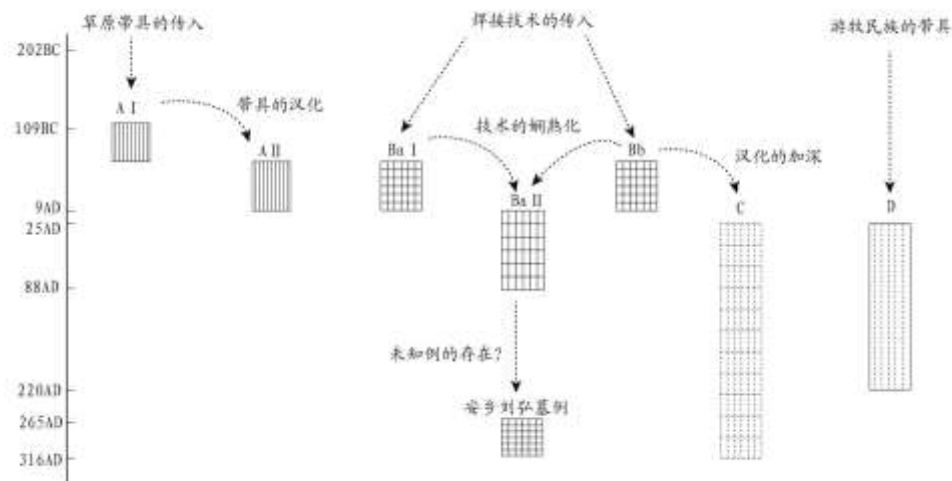
Ba 型的变化方向是带具周缘焊接的装饰物，从 I 式的 Ω 形金线演变成 II 式的菱形框。I 式的 Ω 形金线盛行于西汉中晚期，例如南昌海昏侯墓便出土了大量焊接 Ω 形金线的马蹄金和麟趾金^[59]。平壤石岩里 9 号墓例为近方形的木椁墓，墓室中部出土了带具、剑、“长宜子孙”云雷纹连弧纹镜 2 枚和“居摄三年”（公元 8 年）纪年铭漆盘。因此推测 I 式年代为公元前 1 世纪后半的西汉晚期。

II 式的大连营城子 76 号墓为平面呈甲字形的土圹竖穴墓，墓室西侧出土了带具、兽形钮鎏金铜印和玉剑珌等。发掘报告推断该墓属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并很有可能是新莽时期^[60]。刘金友认为带具扣孔的弧度存在从大到小的演变轨迹，推断该例属于东汉^[61]。寿春刘延墓的被葬者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阜陵质王，歿于汉和帝永元元年（89 年）。安乡刘弘墓的墓主，是卒于西晋惠帝光熙元年（306 年）的镇南将军刘弘。推测 II 式年代以 1 世纪的新莽至东汉前期（光武帝—和帝）为主，其中安乡刘弘墓例的出现较为突兀，中间或有未发现的事例存在。



图五//D 型带具

1. 榆树老河深 105 号墓带头 (105:16-1) 2. 榆树老河深 105 号墓带扣 (105:16-2) 3. 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矩形跨 4. 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带头 5. 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马蹄形跨 6. 扎赉诺尔 1 号鲜卑墓带头 7. 扎赉诺尔 1 号鲜卑墓带扣 8. 和林格尔鲜卑墓带头 9. 和林格尔鲜卑墓马蹄形跨 10.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 (4) 带头 (24.174.6) 11.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例 (4) 带扣 (24.174.7)



图六//马蹄形带具的编年及型式间关系

Bb 型带具焊接金珠的数量没有 Ba 型多，或意味着焊接技术稍稍落后。因此推测 Bb 型比后者稍早抑或是平行关系，属于西汉晚期。

C 型中只有洛阳夹马营东汉墓的年代确定为东汉晚期。王正书根据上海博物馆藏例的铭文进行考证，认为该例或为东晋时期的遗物^[62]。尽管关于纪年铭文存在争议，但纹样构图和安乡刘弘墓例相似，属于西晋的可能性大一些。因此 C 型年代大致为东汉至西晋。

D 型中的扎赉诺尔 1 号鲜卑墓，出土的中原系遗物有漆器、四神规矩镜、写有数行“如意”的织锦等。四神规矩镜一般盛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或认为与新莽时期盛行的谶纬思想密切相关而大量出现^[63]。孙机将该墓例以及吉林榆树老河深 105 墓例归为两汉之际，呼和浩特地区的和林格尔另皮窖墓和讨合气墓出土例的年代是东汉^[64]。因此推测 D 型为两汉之际到东汉时期的遗物。

四、背景和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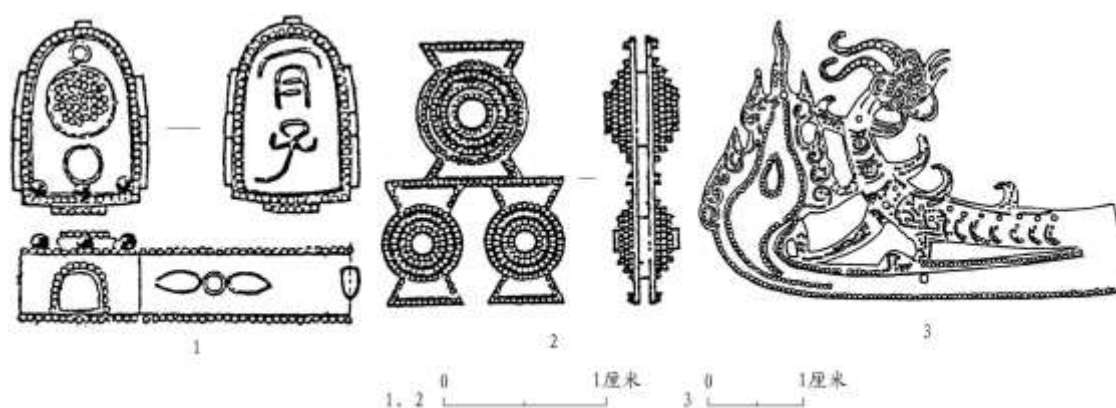
从生产流通的角度来看，马蹄形带具经历了制作→流通→使用→废弃（埋葬）这一动态过程。上述型式及编年分析使得型式间的关系跃然纸上，下面依照这一过程进行探讨。

1. 制作

鉴于飞马纹和野猪纹等纹样题材的特殊性，以及制作技术的复杂性不如中原地区出土的带具，因此推测 D 型带具应该是由游牧民族制作的。其余金银制带具利用复杂的技术，推测在汉王朝官营背景下才有条件生产。

马蹄形带具最早在汉帝国区域出现的是 A I 型, 利用锤揲工艺打制出虎纹等纹样。北方草原特有的北山羊出现在带具上, 意味着汉帝国迎合游牧民族而制作, 抑或是刚吸收这类带具, 处于尚未将其汉化的早期阶段。锤揲工艺最初出现于西亚, 公元前 2 世纪末传入汉王朝中原地区。河北满城 1 号汉墓 (公元前 113 年) 出土的银质马面^[65], 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北山羊纹金饰件^[66], 均为较早使用锤揲工艺的事例。该工艺与汉文化的蟠龙纹相结合, 制作出了 A II 型马蹄形带具。

焊接技术也是在西汉中期从西亚传入汉帝国^[67], 公元前 1 世纪后半开始用于制作马蹄形带具, 从而产生了 B 型带具。焊接金珠和金线的技术渐趋成熟, 走龙纹与焊接技术的结合使汉帝国的带具制作别具一格, 脱离了早期游牧民族的桎梏。降至东汉魏晋, 焊接技术广泛用于金银装饰物的制作。例如扬州邗江甘泉 2 号东汉墓 (67 年), 出土了焊接金珠的灶形胜 (M2: 60) 和龙形金饰件, 其中龙形饰件的纹样和马蹄形带具的龙纹造型相同 (图七)^[68]。此外该墓还出土了王冠形金饰件和玻璃器, 经成分鉴定得知应是西亚地区的舶来品^[69]。可见该时期的汉帝国, 先后将西亚的锤揲及焊接工艺运用于包括带具在内的金银饰件制作中。



图七//扬州甘泉 2 号东汉墓出土焊接工艺品 1. 灶形金饰件 2. 胜形金饰件 (M2: 60) 3. 龙形金饰件

2. 流通

马蹄形带具的空间分布, 以新疆、云南、内蒙古和朝鲜等汉民族周边区域为主, 少量玉带具出现于洛阳。其中 D 型带具大致呈线状分布于大兴安岭西麓至内蒙古中部, 契合了宿白考证的拓跋鲜卑的迁徙路线^[70]。且带具上出现的飞马纹, 与《魏书》记载拓跋鲜卑迁徙时有飞马引路的传说相呼应。

汉帝国在中原制作的 A 型和 B 型带具, 却散见于当时的边郡地区, 反映了中央与边郡的某种联系。以晋宁石寨山 7 号墓例和广南牡宜遗址 4 号墓例进行说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 (公元前 109 年), 兵临滇国并增设益州郡, 赐滇王王印。晋宁石寨山 6 号墓出土了“滇王之印”, 旁边 7 号墓出土了马蹄形带具。云南广南地区在该时期是句町国的中心区域, 广南牡宜遗址出土的多座木椁墓的被葬者或为句町王族^[71], 其中 4 号墓腰坑出土了马蹄形带具。推测彼时汉帝国征服西南夷之后, 伴随着中央舆服印绶的发放, 该类带具作为威信的象征物分发给句町国和滇国的统治层, 包含羁縻地方和分而治之的政治意图。

3. 使用

孙机还原了马蹄形带具的系结方式^[72], 兹不赘述。西汉时期制作的马蹄形带具, 迄今并未见有内部诸侯王使用者, 降至东汉方才出现, 并产生了玉带具。从这个现象推测, 西汉中央生产的该类带具仅分配给边郡地区的统治层, 而内部诸侯王并不使

用。西汉诸侯王墓葬中常见长方形动物纹带具，因此猜测该时期带具的使用存在严格的双轨制，即外部边郡的统治层使用马蹄形带具，内部的诸侯王使用长方形动物纹带具。东汉以降，马蹄形带具渐渐融入汉帝国内部的服饰制度中，玉带具的出现意味着该类带具完全汉化。

4. 废弃及埋葬

马蹄形带具的材质，暗示了使用后丢弃的可能性较低。并且迄今所见的考古资料，大多数发现于墓葬中，表明被葬者会将生前拥有抑或是死后被赏赐的带具一同随葬。洛阳夹马营东汉墓出土例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玉带具等，韧性低，或不用于日常使用。推测东汉至西晋时期，生产玉质等无实用功能的马蹄形带具专门用于随葬。

结语

根据上面的探讨，关于汉晋时期的马蹄形带具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锤揲工艺制作的马蹄形带具滥觞于北方游牧民族，汉帝国在公元前 2 世纪末开始制作。第二，从西亚传来的焊接技术在公元前 1 世纪后半用于马蹄形带具的生产，并和汉文化的龙纹相结合，使得带具制作臻于成熟。第三，西汉时期的马蹄形带具，出于羁縻的目的专门分配给边郡的统治层。第四，东汉以降，马蹄形带具融入帝国内部的舆服制度中，并发展为专门用于随葬的礼制器物。

参考文献：

- [1]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第 247-284 页。
- [2]韦正：《东汉、六朝的朝服葬》，《文物》2002 年第 2 期。
- [3]谭盼盼、张翠敏、杨军昌：《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龙纹金带扣的科学分析与研究》，《考古》2019 年第 12 期。
- [4][日]町田章：《匈奴式带金具の変転》，《末永先生米寿記念献呈論文集坤》，奈良明新社 1985 年，第 1615-1623 页。
- [5]a. [日]志賀和子：《漢代“北方系”带金具考（上）——金銀製打出鉸具について》，《古代文化》1994 年第 46 卷第 7 号；
b. [日]志賀和子：《漢代“北方系”带金具考（下）——金銀製打出鉸具について》，《古代文化》1994 年第 46 卷第 8 号。
- [6][日]藤井和夫：《金製龍紋鉸具製作技法に関する覚書》，《高麗美術館研究紀要——有光教一先生白寿記念論叢》2006 年第 5 号。
- [7][日]大谷育惠：《飛馬文带再考》，《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2013 年第 34 号。
- [8][朝]사회과학원고고학연구소전야공작대：《고고학자료집（제 5 집）》，사회과학원고고학연구소，1978:28.
- [9]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59 年，第 112 页。
- [10]张增祺：《晋宁石寨山》，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8 年，第 99 页。
- [11]Emma C. Bunker, Watt, James C. Y., Zhixin Sun. 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the Eugene V. Thaw and other New York col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3.

-
- [12]该例资料源于“云南考古”网站, [EB/OL][2021-03-08]http://www.ynkgs.cn/view/ynkg_PC/1/27/view/1204.html
- [1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卷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58页。
- [14]a.同[8],第6页;b.[朝]조선유적유물도감편찬위원회:《조선유적유물도감 2》,편찬위원회,1989:321-322.
- [15][朝]사회과학원고고학연구소:《랑락구역일대의고분발굴보고(고고학자료집 6)》,사회과학출판사,1983:23-24.
- [16][日]榎本杜人、中村春寿:《楽浪漢墓第2冊》,楽浪漢墓刊行会1975年,第21-22页。
- [17]同[11],第112页。
- [18]同[11],第116页。
- [19]a.[日]朝鮮總督府:《楽浪郡時代ノ遺蹟(図版)》,朝鮮總督府1925年,第117-118页;b.[韩]국립중앙박물관편:《특별전낙랑——The ancient culture of Nangnang》,솔,2001:64-65.
- [20]刘复兴:《汉代掐丝焊珠七龙纹带扣》,《文物春秋》2017年第6期。
- [21]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营城子汉代墓地考古工作队:《辽宁大连市营城子汉墓群2003M76的发掘》,《考古》2019年第10期。
- [22]Miho Museum. Miho Museum 開館一周年記念図録. 信楽町(滋賀県): Miho Museum, 1998:22-23.
- [23]许建强、邱雪峰:《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遗物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4年第3期。
- [24]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 [25]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
- [26]同[11],第114页。
- [27]同[6]。
- [2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 [29]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玉器选萃》,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年,图18。
- [30]王正书:《上博玉雕精品鲜卑头铭文补释》,《文物》1999年第4期。
- [3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63-67页。
- [32]同[31]。

[33]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9期。

[34]伊克坚、陆思贤：《土默特左旗出土北魏时期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35]陆思贤：《和林格尔县另皮窖村北魏墓出土的金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36]同[11]，第115页。

[37][韩]노지현、유혜선：《석암리 9 호분출토금제띠고리의제작방법고찰》，《박물관보존과학》2016년제 17집。

[38]图片源于[1]，第260页。

[39]图片源于[5]a，第20页。

[40]图片源于[10]，第99页。

[41]图片源于[13]，第858页。

[42]图片源于[5]a，第20页。

[43]图片源于[5]a，第22页。

[44][日]梅原末治、藤田亮策：《朝鮮古文化綜鑑（第3卷）》，養德社1959年。图片源于[1]，第260页。

[45]图片源于[1]，第261页。

[46]图片源于[1]，第261页。

[47]同[3]。

[48]同[6]。

[49]图片源于[1]，第261页。

[50]图片源于[1]，第262页。

[51]图片源于[1]，第262页。

[52]同[1]。

[53][日]藤井康隆：《第9章晋式带金具の成立背景》，《中国江南六朝の考古学研究》，六一書房2014年，第133-146页。

[54]图片源于[1]，第262页。

[55][日]町田章：《匈奴式带金具の変転》，《古代東アジアの装飾墓》，同朋舎 1987 年，第 80-89 页。图片源于第 87 页。

[56][日]町田章：《古代带金具考》，《古代東アジアの装飾墓》，同朋舎 1987 年，第 50-79 页。图片源于第 51 页。

[57]图片源于[35]，第 53 页。

[58]图片源于[31]，第 66 页。

[5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 年第 7 期。

[60]同[21]。

[61]刘金友、王飞峰：《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金带扣及其相关研究》，《北方文物》2015 第 3 期。

[62]同[30]。

[63]叶康宁：《王莽与博局》，《古代文明》2009 年第 1 期。

[64]同[1]。

[6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第 200-201 页。

[66]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博物館珍品圖鑑》，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62-63 页。

[67]同[6]。

[68]黎忠义：《汉-唐镶嵌金细工工艺探析》，《东南文化》1985 年第 1 期。

[69]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 年第 11 期。

[70]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 年第 5 期。

[71]万杨：《广南县牡宜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435 页。

[72]同[1]。